

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四)

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四)

中共中央党校印

一九八〇年五月

## 说 明

这个选读本，是按照我校第四期高、中级干部轮训班教学计划规定的阅读书目编印的，现按学习单元分册印出。

一九八〇年五月

# 目 录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	(1)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1)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 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	(4)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 相互关系.....	(12)
列 宁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 案初稿.....	(23)
列 宁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30)
斯大林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节选) .....	(35)
Ⅷ 党 .....	(35)
斯大林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50)
斯大林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62)
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节选） .....	(67)
2.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67)

斯大林	论自我批评.....	( 71 )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节选) .....	( 78 )
	干部政策 .....	( 78 )
	党的纪律 .....	( 80 )
	党的民主 .....	( 80 )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 82 )
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	( 95 )
毛泽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12)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节选) .....	(118)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118)
毛泽东	关于健全党委制 .....	(125)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的报告 (节选) .....	(127)
十	.....	(127)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9)

列 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sup>[1]</sup>（节选）

### 二

####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

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靠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一个革命政党的纪律，一个真正能够成为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

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这个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具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差不多半个世纪期间，大约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十五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

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等运动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过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卓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 四

###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 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 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

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突然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必然很快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旧的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新异的（多少新异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在俄国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末毫无疑问，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

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为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它的独特的“革命性”或“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认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自然，我们摒弃个人恐怖；只是因为这种手段不适当，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末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还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开除伯恩施坦的党籍，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sup>(1)</sup>）**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现在1920年，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一切政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

---

(1) 参看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9—253页）。——编者注

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政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sup>[2]</sup>的党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失节行为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总地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起到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时止这一完全终结了的历史时期，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大体上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却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三十六年①）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25页。——编者注

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的论据，是1905年抵制议会的成功经验。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谘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sup>[3]</sup>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起的，即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sup>①</sup>，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

① 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这个历史时期已经完全终结，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sup>[4]</sup>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就在1918这一年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柏利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说：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sup>①</sup>（“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

---

<sup>①</sup> 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

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劳工分子”（“拉布分子”<sup>[5]</sup>）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表现出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猾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无异于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那种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

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们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末以来就在实际上制定了它的国际主义政策。它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保卫祖国”的谬论。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去谋求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大臣职位。革命在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做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加以破坏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sup>[6]</sup> 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

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 五

###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7〕。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号一律按照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